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16.04.002

# 迎接我国科技情报事业的第二个春天

赵冰峰

(北京和君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 100101)

**摘要:** 本文重点阐述了我国科技治理的三角模型和科技情报事业的三阶段历史演变, 以及如何借助时代大势, 转换好“建设者”的职能定位, 全面提升科技情报功能, 通过多项制度化建设, 根本上破解我国科技情报事业面临的战略难题, 以顺利迎接科技情报事业发展的第二个历史高潮。

**关键词:** 科技治理, 科技情报, 科技创新, 科技安全, 国家安全

**中图分类号:** G350, D815.5

## Meet the Second Prosperity of China'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ZHAO BingFeng

(Beijing HeJun Consulting Co. Ltd.,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aid of triangle model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governance, this paper explained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hina'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service. In order to meet the second prosperity of China'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this paper described the methods to convert the management functions, improve the service functions, and fundamentally solve the strategy problem of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service through the new system construction.

**Keyword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governanc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ecurity, national security

**作者简介:** 赵冰峰(1978-), 咨询师, 研究方向: 情报理论, 致力于系统构建服务国家安全与国家发展的情报学科体系和治理理论体系。

科技情报是国家科技情报机构主导开展的认知对抗活动，目的在于确保战略性装备的科技优势，防范科技资源流失。我国科技情报事业应该往哪里发展、科技情报体系应该承担什么样的国家责任、科技情报机构应该如何改革、科技情报工作应该如何创新等，始终是困扰科技情报界与科技情报学界的一大战略性难题。

受国家战略的调整，我国的科技情报事业随着上世纪 50 年代国防体系和工业经济建设的兴起而获得了大发展。但 80 年代后随着工业体系建设的基本完成和改革开放战略的实施以及国家体制改革的推进，科技情报界实行了大规模的职能转变和机构转型，科技情报事业经历了从兴盛到衰落的历史性转变，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情报学界热议了近 30 年但依然困惑难解的话题，我国很多知名专家学者比如钱学森、包昌火、梁战平、霍忠文<sup>[1]</sup>、符福垣<sup>[2]</sup>、武夷山<sup>[3]</sup>、郑彦宁<sup>[4]</sup>、沈固朝<sup>[5]</sup>等，因应时代发展需要，在科技情报概念、科技情报职能、科技情报方法、科技情报机构变革、科技情报政策等方面做出了开创性与建设性的理论阐述，为引领我国科技情报事业的不断进步做出了历史贡献。党的十八大后，我国全面实施国家安全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情报事业面临着国家安全治理、军事国防变革、经济结构转型、

科技创新发展等新的历史机遇与时代挑战，应在理论上继续探索突破，以迎接新的发展需要。

## 1、科技治理的三角模型与科技情报事业的三阶段演化

从国家的角度分析，我国的科技治理体系可以划分为三大部类，第一类是军事、国防、安全(对外)、公安等负责科技安全的核心部门，以及边防、海关、国土、通讯等科技安全的支撑部门；第二类是农业水利、能源矿产、工业信息、交通物流、金融外贸、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等负责工农业科技创新与科技应用的部门；第三类则是国家科技情报、地方科技情报、行业科技情报等负责科技情报职能活动与管理的专门部门；三部类在科技治理体系中，互相支撑，协同发展，分别以科技安全、科技发展和科技情报的要素形式在如图 1 所示的模型中，共同构成比较稳定的联动结构关系，要素之间的支撑与协同关系则因不同的国家治理政策呈现出强弱不等的变化，并呈现出有规律的演化过程。

科技治理三角模型中的(A)，表示了我国在建国后 5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初期的近 30 年时间里，是科技情报事业的第一个春天，科技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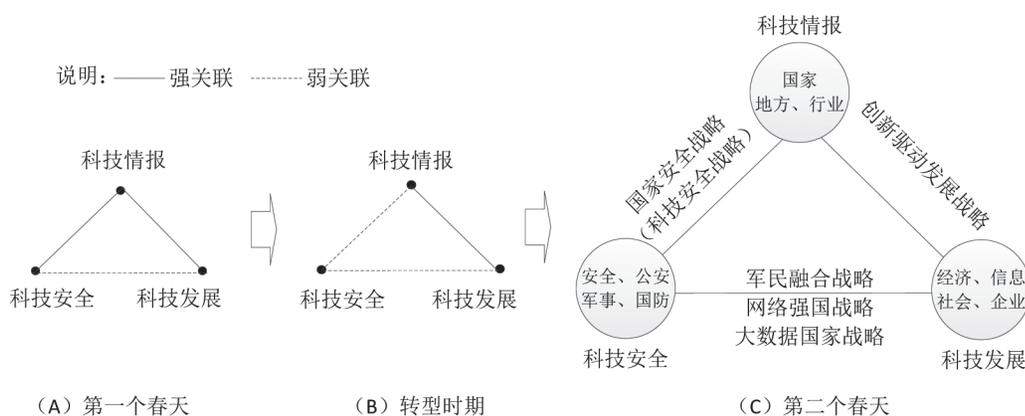


图 1 我国科技治理的“三角模型”与科技情报的三阶段演化

与科技情报之间、科技发展与科技情报之间建立了强有力的协同关系。“一五”期间，我国在苏联的援助下，提出和实施了全面的国防工业建设和工农业经济建设，在国家推动下，于1956年设立了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即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前身），1958年设立了国防科委，60年代逐步设立了各行业和各地区的科技情报部门和国家科技情报网络，1977年设立了军委科技装备委员会<sup>[6]</sup>，集国家之力，开展了大规模的对外科技情报获取与研究，为我国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国防工业建设和以“电子、化工、机械”等为代表的工农业经济建设，发挥了“耳目、尖兵、参谋”的战略作用。

科技治理三角模型中的（B），表示了我国在80年代初期至党的十八大前的近30年时间里，是科技情报事业的转型时期，科技安全与科技情报的协同功能被逐步弱化，科技发展与科技情报的协同功能继续维持了稳定的发展关系。在该时期，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为指导，我国实施了全面的改革开放政策，国家力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防工业建设大幅减缓，科技安全与科技情报部门被全面整编与重组，全国科研机构的财政经费进行了调整，1982年设立了国防科工委，1983年设立了国家安全部，1992年科技情报机构陆续实施了改名活动<sup>[7]</sup>，科技情报职能全面转型为面向市场经济的科技信息服务，为我国科技创新、科技信息资源建设<sup>[4]</sup>等做出了历史贡献。值得一提的是，从结果上分析，这次转型只是策略性的或是调适性的，并非彻底的部门转轨，更非学术或理论的研究失误，比如在改名运动后，只有部分的科技情报机构与职能转型为科技信息资源管理与图书馆管理方向，部分国防科技情报机构与职能被保留了下来，而且这种策略性或调适性转型造成了巨大的学术混乱，引发了所谓的“情报名不副实”<sup>[8]</sup>的全面争论。

科技治理三角模型中的（C），表示了我国

在党的十八大后很长一段时期（10-30年），是科技情报的第二个春天，科技安全与科技情报之间、科技发展与科技情报之间、科技安全与科技发展之间，相互协同功能将获得全面强化。党的十八大在“四个全面”战略指导下，2013年设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2014年设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并相继提出了国家安全战略（实行包括科技安全在内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军民融合战略、网络强国战略、大数据国家战略等多个顶层战略，并以“十三五”政府规划的形式全面组织实施，这就为科技情报部门与科技安全部门之间的大融合、科技情报工作的大规模扩展、科技情报机构的“建设型”职能转型、科技情报事业的再次大发展，奠定了国家制度基础和战略基础。

## 2、从工作者、服务者到建设者的科技情报职能转变

随着国家大政方针的变化，我国科技情报部门在科技治理体系中的职能，经历了工作者转型为服务者，从服务者迈向建设者的两次实质性跃迁。

在科技情报事业发展的第一个春天，无论是国家科技情报部门还是地方与行业科技情报部门，其主要职能包括科技情报工作和情报科技两大类。其中，科技情报工作包括科技情报侦察、人力科技情报工作、公开科技文献收集、科技文献信息储存整理与检索服务、科技文献信息系统建设、科技情报规划研究等业务性工作内容，直接为国家的国防武器装备的研发与生产、工业装备的研发与生产、先进农业装备的研发与生产等提供情报信息获取与分析服务；情报科技则包括钱学森先生总结的情报获取科技（注：应该包括侦察科技和调查科技）、情报资源存储与检索科技，以及情报分析科技等<sup>[9]</sup>。这两大类科技情报职能属

于业务性或技术性层次，故可称其为“工作者”职能。

在科技情报事业发展的转型时期，除少部分的国防科技情报机构获得保留以外，其他科技情报部门基本转型为市场经济中科技信息产品的供应者角色，除承担部分政府规划与咨询职能外，主要面向政府部门、院所高校的科技研发部门、各类企业科技研发单位等<sup>[10]</sup>提供公开科技信息的获取—存储—检索服务，以及相应的科技文献信息数据库建设、信息组织技术与数据分析技术研究、人才培养与科技推广等经营性业务。这时期的科技情报职能属于面向市场经济的经营属性，故可称其为“服务者”职能。

但是在科技情报事业发展的第二个春天，科技情报部门不是要简单地回归到“工作者”的职能状态，比如有大量的专家学者建议中国科技情报机构要强化情报获取与情报研究等力量，显然在中国各行各业的科技情报工作能力普遍获得提升的新时期，这种战略定位是注定没有出路的。因此，科技情报除了继续服务科技发展领域、服务科技创新市场主体<sup>[11]</sup>以外，更重要的是以“国家情报体系建设者”的身份，面向包括科技安全在内的国家安全领域，增加包括战略性科技信息资源建设与管理、战略性科技创新研究、战略性情报科技研发等核心职能体系，以与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信息安全等体系进行总体性融合；而且随着我国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

面向国际安全的信息资源管理与架构、技术平台建设、大量数据的技术分析、面向数据处理的核心科技研发等，出现巨大的空白性国家需求，科技情报部门必将以“国家情报体系建设者”的身份承担起整合社会各界情报科技研发力量的重要职能；特别是随着国家科技强国战略的全面实施，中国将在重大科技创新领域引领世界的发展，这在客观上必然要求我国实施科技安保政策，以防止战略性装备、战略性技术、战略性人才等的全球流失和区域扩散，科技情报部门则需要以“国家情报体系建设者”的身份全面参与科技流失风险控制、科技安保实践、科技安保治理等工作。

### 3、科技情报功能结构与战略提升

然而，尽管战略需求已经显现，但我国科技情报部门在经过长期的转型发展后，尚不具备全面承接这种需求的能力，比如在图2所示的当前我国科技情报部门的功能结构中，信息资源、信息管理、信息研究与科技研发四大领域只具备初步的资源与能力，在人才队伍、数据库建设、系统平台、情报研究、科技研发、情报理论等方面远不足以向国家安全领域进行力量延伸，这就需要国家领导层以及科技情报部门转变思想观念，开展跨越式的领导机制建设、组织机构调整、组织能力改善、人才队伍建设、法律法规建设等综合性改革与战略性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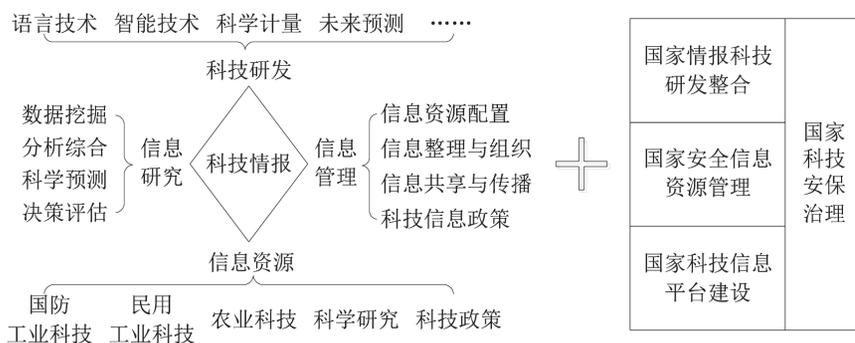


图2 我国科技情报部门的功能结构与战略提升

具体而言,我国科技情报部门在国家安全战略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指导下,至少应完善和发育出如下四大新的功能体系:(1)国家科技信息平台建设,即在涉及国家重大创新的领域,面向全球获取、加工和提供相应的科技文献与信息内容,覆盖科技人物、科技成果、科技设备、科研制度、科研激励、科研投资、科研项目、科研政策等;(2)国家安全信息资源管理,即在服务国家安全战略方面,科技情报部门将为军事、国防、安全、外交、文宣、经济、公安、边防、海洋、民政、地方政府、国企等大型企业提供全球安全信息资源获取、储存、信息组织、技术分析等能力配置与服务保障体系;(3)国家情报科技研发整合,即在服务国家安全战略方面,以国家安全的身份外包采购或分包研发<sup>[12]</sup>具有共性特征的情报科技产品、情报科技方法、情报科技人才等,以总体服务于各大国家安全治理的科技需要;(4)国家科技安保治理,即在服务国家安全战略方面,以科技安全治理者的身份参与重大的科技安保工程项目、科技安保宏观治理决策等。

#### 4、五大科技情报制度变革措施

任何国家重大治理体系的实施首先需要从国家制度的变革着手。为了迎接第二个科技情报的春天,我们应至少采取如下五大措施:

(1)建立科技情报领导与协调机构,在现有的国家治理框架中,补充完善和建立起“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科技部——科技部科技情报司(即恢复已撤销的‘科技情报司’)——由全国科技情报院所组成的国家科技情报合作网络”四级联动的领导与协调机制,并明确相应的权责分工;在全球化时代,我们面对的科技情报问题是复杂而多元的,既要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又要满足国家安全的需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建设起纵向层级分明、横向分工合理的国家情报治理体

系<sup>[13]</sup>。

(2)重建国家科技情报网络,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全国性科技情报合作网络(还有称“专业科技情报网”)基础<sup>[14]</sup>上,以“国家-地方+行业”的部门结构为基础,以“层级分工、区域错配、系统共建、信息共享、联合协同”等原则为指导,以“中国-亚太-全球”为地理空间扩展方向,构建统一的国家科技情报协作网络,强化信息集成、智库服务与科技引领等作用,为国家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国家安全信息平台建设、国家情报科技集成研发、国家科技安保治理等奠定物质基础;面对不断发展的数字化挑战和多样化的国家治理目标,我国的科技情报网络必须在情报获取、情报分析、情报设计、情报行动等方面实行基于网络结构的集成化和一体化治理模式,即由不同的网络节点承载和执行不同的任务,节点间整体发挥起协同联合的效应。

(3)编制国家科技安全战略,出台《国家科技安全战略》报告,在国家安全战略框架下,与国家安全领域的各大部门,联合确立科技情报战略,明确科技情报工作重点项目,明确工作模式和考核激励体系等;科技安全是科技情报服务的两大部门之一,而我国在科技安全领域的治理还刚刚起步,必须首先借助法治手段发挥起指导、协调与监管等作用。

(4)出台科技情报政策和法律法规等保障体系;可参照我国1991年颁布的《国家科学技术情报发展政策》<sup>[15]</sup>,在跨部门融合措施、资源管理措施、决策服务保障、系统平台建设与管理、科技研发管理、理论研究、队伍建设、财政安排、成果共享、危机管理等方面做好制度性保障工作,以满足我国科技情报战略与具体目标的落地实施。

(5)建立科技情报理论与人才教育体系,建设科技情报学院和科技情报智库,设立国家重大理论课题,提升科技情报协会地位,全方位建设人才队伍和能力水平;人才是科技情报事

业成败的关键，没有一支坚强有力的人才队伍，我国的科技情报事业就根本无从谈起。

### 5、迎接科技情报的“第二个春天”

科技创新是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源动力，而科技情报是服务科技创新、保障科技安全、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随着世界格局的演变和国家战略的调整，我国的科技情报事业已悄然迎来了第二个发展的春天，但机遇的到来还需要科技情报界与国家领导层共同努力，通过事业改革、机构改制、机制创新、队伍建设等具体落实与切实推进。因此，我们唯有坚定战略、鼓足干劲，才能再创辉煌！

#### 参考文献

- [1] 霍忠文. 增长、发展与现代国防科技情报服务保障体系的建设[J]. 情报理论与实践, 1996(2):1-2.
- [2] 符福垣. 当前装备科技情报学科体系建设中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04, 27(1):1-5.
- [3] 武夷山. 关于我国科技情报工作的几点思考[J]. 中国科技资源导刊, 2009, 41(6):73-76.
- [4] 郑彦宁, 宋振峰. 我国科技情报行业现状与发展对策分析[J]. 情报学报, 2007, 26(5):790-795.
- [5] 沈固朝. “耳目、尖兵、参谋”——在情报服务和情报研究中引入 intelligence studies 的一些思考[J]. 医学信息学杂志, 2009, 30(4):1-5.
- [6] 赵冰峰. 论现代中国的情报活动变迁[J]. 情报杂志, 2016, 35(5):11-14,4.
- [7] 王洪林, 赵冰峰. “科技情报”改名“科技信息”后的反思[J]. 情报杂志, 2014(6):1-3.
- [8] 沈固朝. 两种情报观:Information 还是 Intelligence?——在情报学和情报工作中引入 Intelligence 的思考[J]. 情报学报, 2005, 24(3):259-267.
- [9] 钱学森. 科技情报工作的科学技术[J]. 情报理论与实践, 1983(6):3-10.
- [10] 郑彦宁, 杨阳, 赵筱媛. 我国科技情报机构情报研究业务发展现状调查[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0, 33(7):63-66.
- [11] 黄力. 我国科技情报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转型途径[J]. 情报杂志, 2016, 35(3):28-31.
- [12] 张家年, 卓翔芝, 谢阳群, 等. 创新情报科技保障国家安全: IARPA 的研究机制与启示[J]. 情报杂志, 2016, 35(1):1-7.
- [13] 赵冰峰. 论情报(下)——情报活动机理及和平建设型国家情报体系[J]. 情报杂志, 2015(8):1-6.
- [14] 陈国华. 我国科技情报工作的一种组织形式——对科技情报网的探讨[J]. 情报科学, 1981(5):89-92.
- [15]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国家科学技术情报发展政策[M]. 北京: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91.